



## 探究貧富分化的深層原因(上)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黃友嘉博士

社會對貧富懸殊和在職貧窮問題的討論日趨熾熱。有人將問題歸咎於特區政府的無能和管治失當，更有意見指這是政治體制所衍生的社會問題。筆者嘗試在下文列舉坊間常用的幾個指標，並透過不同角度的分析，探討貧富分化問題背後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和經濟原因。

### 以時間序列「縱觀」堅尼系數

堅尼系數是衡量貧富差距最常用的指標。本港的堅尼系數從 1981 年的 0.451 微升至 1986 年的 0.453，其後加速上升至 1991 年的 0.476 及 1996 年的 0.518。1996 年後增速減緩，2001 年和 2006 年分別為 0.525 和 0.533。

香港貧富差距擴大由來已久，甚至是一個橫跨近三十年的中長期趨勢，情況惡化的高峰期並非是回歸後，而是 80 年代中至 90 年代中。貧富懸殊的問題成為近期大眾的聚焦點，除了與政治生態和輿論環境的轉變有關之外，在某種程度上亦可能反映，市民追求「經濟平等」的著眼點已從過往認同「機會平等」逐漸轉為注重「均貧富」式的「結局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堅尼系數只是按住戶原本每月收入計算而得；由於政府的稅收和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會直接影響收入差距的程度，故國際間在引用堅尼系數時，經常會編制另一個包含政府再分配效應的系數作為參考。根據「香港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按人口平均延伸除稅和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計算的堅尼系數在 1996、2001 和 2006 年分別為 0.426、0.419、0.424；顯示 1996-2006 期間，堅尼系數沒有惡化，更有輕微下降跡象。

單從數據可見，香港貧富差距拉闊主要發生在回歸前十年左右的時間；而特區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確已發揮了抑壓貧富差距擴大的作用。當然，這絕不意味著香港貧富懸殊問題不嚴重，或者政府已經「竭盡所能」。但若要批評特區政府施政失誤導致貧富懸殊惡化，則須以公平的態度以及從事實出發。

## 從國際比較「橫觀」在職貧窮

就業人口收入相對於整體經濟的提升速度可以反映勞動者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否按相應比例「分一杯羹」。在 2001 年至 2009 年期間，香港的名義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了 20.5%；但就業人口收入的中位數只從每月 10,000 港元微升為 10,500 元。僱員收入的提高速度落後於經濟增長，反映打工一族未能充分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勞動力相對於資本的議價能力有所下降；勞資收入背道而馳亦經常被指是造成香港貧富差距擴大和在職貧窮的原因。但此現象並非香港獨有；多個國際權威機構的研究不約而同證實了這一點。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工作世界報告 2008」，1990 至 2005 年期間，73 個有數據可供分析的國家中，就有 53 個國家的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下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一項名為「不平等的增長」的研究報告亦指出，逾四分之三的 OECD 國家在近二十年貧富差距趨於擴大，有些國家更出現中產與富有階層的差距亦相應擴大的現象，反映低收入者受惠於經濟增長的程度遠遜於高收入階層。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研究亦發現，OECD 國家從 1980 年代開始，勞工收入在 GDP 中所佔比例普遍下降，中低技術的勞工更是首當其衝；該研究透過統計數理模型找出了多個顯著性的原因，包括資訊科技的發展、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國等新興經濟釋放出大批勞動力、生產外判等跨地域營運模式的興起、以及勞動力移民等。

筆者引述多項國際研究報告，並非意圖將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合理化，而是有感於香港作為一個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系，緊貼著世界經濟發展的脈搏，在分析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現象時，我們往往可以從相關的國際性趨勢中得到啟示。正如在分析香港經濟的現況及展望時，不可能撇除全球金融海嘯、歐元區國債及匯率波動等問題帶來的影響；同樣地，要找出香港經濟轉型、貧富懸殊擴大等現象的原因，我們亦不能閉門造車，無視全球經濟一體化等外圍環境因素。

## 勞動力全球化的溢外效應

事實上，IMF 所列出的貧富分化成因亦適用於香港；這些問題其實無一不是香港在過去三十年裏面對的挑戰，當中有些因素更因為香港的特殊情況而具更強的影響力。例如，香港的十五歲以上的勞動人口中，教育程度在初中或以下的佔 29%。這個比例遠高於西方發達國家，相信亦是香港的堅尼系數高於其他發達國家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近年以資訊科技及國際視野為本的知識型經濟大行其道，低學歷人口

的競爭力難免每況愈下。

根據 IMF 研究報告的推算，全球勞動力的實效供應在 1980 至 2005 年間迅增四倍；中國等東亞國家貢獻幾半，主要是因為這些地區適齡勞動人口劇增以及加速開放對外貿易。勞動力全球化使得大多數 OECD 國家的勞工在國民收入中所能分享的比重(即勞工份額)趨於縮小，其發生作用的主要渠道是商品與服務貿易，而勞動力移民和生產工序外判的影響目前仍較為有限。

香港背靠中國這一全球最大的勞動力供應基地，兼且與內地的經濟和社會融合不斷深化；內地勞動力源源不絕供應對香港的「溢外效應」除了透過貿易傳導之外，相信更多是透過產業轉移以及移民等直接的渠道。1980 年代以來，香港勞動密集型工業大舉北移，製造業在本地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 1981 年的 21.8% 下降至 2008 年的 2.5%，聘請的員工從 99.6 萬減為 14.2 萬人；與此同時，香港廠商在內地聘請了超過 1,000 萬的工人。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在短時間內發生如此巨大的蛻變，在 OECD 國家實屬罕見；對香港收入結構的影響極為深遠，亦使得本港成為勞動力全球化對收入結構影響的一個極端案例。

至於內地新移民對本港收入分配的影響以及可供考慮的政策選擇，筆者將在下周本欄目繼續討論。

(註：本文已登於「明報」2010 年 6 月 10 日「筆陣」專欄)